



周恩来与中国现代化道路

■ 程美东

上，中国共产党已经将“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明确写入政治报告中。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提出现代化思想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其基本认识取向在1949年之前就已经形成。

周恩来与“四个现代化”概念的确立

《周恩来年谱》记载，1950年11月上中旬，周恩来三次召集刘伯承、陈士榘等陆军大学筹委会成员开会，磋商筹建事宜，年谱中载有：“搞现代化的军事建设和现代化的军事学院，我们都没有经验。军事学院的办学方针，仍然是抗大的方针，要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

1954年9月，周恩来在《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中明确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明确“没有现代化的技术，就没有现代化的工业”，初步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我们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1959年12月24日，周恩来提出“需要加快建设我们的国家，使我们国家更快地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1960年1月，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要求：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和现代国防。这样才能建成一个既富且强的社会主义国家。”1960年2月，他提出“工业、农业、科学、国防四个现代化”。1962年3月27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式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艰巨的、也是十分光荣的任务”。1963年1月29日，他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现代化。”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任务：“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1975年1月13日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他重申了“四个现代化”战略：“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世界现代化历史经验与周恩来关于“四个现代化”道路的审慎理智选择

“四个现代化”思想的提出，从大的方向和原则来看，是中国共产党集体的探索，其基本思路是如何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直接参照对象无非是以下几个方向：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经验，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经验，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经验。今天世

界上的发达国家也就20多个，在1950—1960年周恩来酝酿“四个现代化”思想时，也就西欧、北美、北欧一些国家实现了那个时代的现代化，即使在那些国家中，很多也是后发追赶式的现代化国家，苏联的现代化道路从沙俄时代算起都一直是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发展道路，亚非拉很多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多开始于二战后、与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几乎同步开始、属于典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文化落后基础上开始的。世界现代化的经验中，最值得中国借鉴的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经验教训。当然，原发现代化国家的经验也值得借鉴，比如要重视资金积累、重视国际贸易、重视工业化等，但是原发现代化国家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通过殖民侵略和扩张来实现现代化的资金积累，这一点后发现代化国家不能学习，因为它不仅不符合人道主义，也破坏了世界秩序，后果极其严重。德意日等后发现代化国家当年通过军事扩张、发动侵略战争来实现自己的现代化目标也不行，给本国和世界都带来了严重灾难。亚非拉等很多在一战、二战后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是建立在给发达国家提供资源供给、产业单一的严重依附性基础上的发展模式，这注定了他们不可能实现真正独立的发展和繁荣。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是按照轻重依次次第减弱的模式来实现追赶现代化发展，这个模式虽然速度较快，但一来造成国内人民之间矛盾加重，二来引起经济结构畸形、很难持续长期发展，所以1956年之后我们也敏锐地意识到不能完全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如此一来，中国的现代化既不能走殖民掠夺的道路，不可能走武力扩张的道路，不能走依附性畸形发展的道路，不能照搬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更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必须要独立自主地探索。周恩来综合党内共识而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发展道路，就是对于以上世界现代化发展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

其一，“四个现代化”是全面系统的现代化，不是单一畸形的现代化。1953年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中心是工业化，到1959年时，我们的工业产值就已经超过了农业，但我们依然整体上是落后国家，这就说明工业化是个系统工程，需要以农业为基础，需要以科学技术为核心，只有这样基础之上的工业化才能保证国防现代化。这个现代化的全面性集中体现在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目标设置上，没有这个部署，我们今天很难成为全世界制造业大国和国防强国。

其二，“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周恩来从一开始谈论现代化问题时，重点谈工业、农业、国防，没有提科学技术，到八大前后，他意识到工业、农业、国防现代化是目标，科学技术现代化才是关键和保障。这个认识对于我们实现两弹一星、实现有限条件下的重大问题上赶超战略的实施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三，“四个现代化”具有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使得它的实践性、可行性有了充分保障。1964年12月周恩来在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任务的同时，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

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有了这样的战略部署，才使得实际工作安排不会落空、有条不紊，其基本的思路和方法一直坚持到今天。

“四个现代化”理念的价值取向

“四个现代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坚持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它不是简单的技术层次的口号和目标，其实体现了20世纪50年代前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若干价值取向，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内在务实有效的政治价值取向。自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客观和主观因素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中把理念中的阶级斗争等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问题视为工作的中心，这在一定时空范围条件下有其必要性，但是容易惯性化地发展成务虚成分过多的清谈和争论，容易忽视涉及国计民生的实际工作。“四个现代化”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最大化地超越了当时意识形态上的争论，把实际工作的四个方面特别列出来，体现出鲜明的务实的政治价值取向，对于克服过分务虚的“左”的思想取向具有重要的遏制作用。

对于知识分子的尊重。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担心，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一度是个普遍性问题，这主要源于十月革命后俄国不少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消极态度。苏俄的这种取向以及中国旧知识分子客观上存在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习俗，导致在一段时间内影响了我们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但从抗战开始，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接收了大批知识分子入党，极大地促进了革命事业的成功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原因，知识分子尤其是没有经过民主革命历练的国统区知识分子包括海归知识分子，一度没有像工农分子那样得到高度的政治尊重。社会主义改造快结束时，周恩来就开始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身份奔走呼号。1956年他两次在党的会议上为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属性做肯定的定性，1962年更是和其他领导人一起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周恩来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指出：一个在本职工作中训练有素的人，比起一个热衷于政治但没有专业技能的人对社会主义发展更有价值。没有对于知识分子的尊重，是不可能自信而且响亮地提出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口号的。

生产力中心论。“四个现代化”的核心准则其实就是生产力中心论，强调把生产力发展好。虽然在当时没有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四个现代化”的四个方面哪一个不是体现生产力的内容？生产力中心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四个现代化”理念的政治合理性的基础。所以，“文革”结束后，当时的党中央因为坚持四届人大上周恩来宣布的“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 and 部署，我们很快就实现了拨乱反正，摆脱了错误路线的束缚，并最终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与“四个现代化”战略阶段内含的生产力中心论的理论逻辑所起的内在涵养作用密不可分。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中心主任）

科学理解和准确把握『大思政课』的质量度

■ 蔡文成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善用“大思政课”，首先要科学理解“大思政课”的本质、内容和形式，准确把握“大思政课”贯穿立德树人全过程。

“大思政课”的根本在“人”

大思政课的根本任务是育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大思政课”的主体是人，教师既是主体，又是主导；学生既是对象，也是主体，二者共同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大思政课”的关键是教师，育人者必先育己、立己者方能立人，传道者必先明道信道。思政课教师是教育者、主导者、实践者，要坚持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做到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让有师德的人立德行。同时，思政课教师首先要树立“大思政课”理念、掌握“大思政课”方法、增强“大思政课”能力，秉持“四个相统一”、四个“领路人”“四有好老师”的要求，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研究“大学问”，争做“大先生”。“大思政课”的主体是学生，学生是学习者、成长者、参与者，学生的知识掌握、能力养成、素质提升、价值建构等需要通过自己主动、能动地参与学习与实践来完成。“大思政课”必须以“以学生为中心”，围绕学生、尊重学生、激励学生、培养学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让“大思政课”真正走进学生思想、走进学生心灵。“大思政课”既要教师的“主导性”启发“主体性”，又要以学生的“主体性”激发“主导性”，真正引导学生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

“大思政课”的核心在“课”

“大思政课”首先是思政课，是关于思政课创新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方略。“大思政课”体现思政课的属性和本质，遵循思政课程规律和功能，完成思政课的目标和任务；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上是一致的，在课程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学习体系上是统一的。“大思政课”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就在于将“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有机结合起来，将思政理论和社会实践统一起来。“思政小课堂”是立德树人的主阵地和主渠道，具有政治性、思想性、价值性、教育性等主体功能；“社会大课堂”是铸魂育人的大熔炉和大学校，推动思政课程理论实践化、具体化、丰富化。

通过“思政小课堂”，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学生头脑，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原理、观点和方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通过“社会大课堂”，挖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生动、最鲜活的实践素材，让学生在社会实践和课程思政中，增长才干，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思政小课堂是基础，大课堂是拓展；小课堂重在“知”，大课堂重在“行”；小课堂立足“引进来”，大课堂倡导“走出去”，“大思政课”实现了思政课的“大和小、内和外、知和行、学 and 用”等的有机统一。

“大思政课”的关键在“大”

“大思政课”的“大”既不是数量的“多”，也不是范围的“广”，更不是内容的“泛”，而在于立足大背景、大历史、大时代、大变局，树立大目标、大理念、大视野、大格局，用好大学科、大教材、大题材、大素材，让思政课走向社会、走进生活、融入实践、深入学生，真正把思政课办成思想大课、人生大课、社会大课、时代大课。

从目标而言，“大思政课”应树立大理念、大视野，立足培养胸怀“国之大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勇担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使命和任务；从时间来看，“大思政课”应回应大历史、大时代，引领学生走进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文明史的深处，回答好、讲清楚中国之问、历史之问和时代之问；从空间审视，大思政课应建构大格局、大体系，打破课内课外、校内校外、网上网下等限制，把思政课置于更广阔的物理空间、社会空间、虚拟空间，实现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从内容来看，大思政课应聚焦大主题、大教材，把历史和现实、中国和世界、理论和实践的生动素材融入思政课，形成课程体系、教材体系相统一的“课程集群”；从方法来说，大思政课应推进大融合、大创新，坚持“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相融合，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增强思政课的吸引力和满意度。

“大思政课”的生命在“用”

思政课的实质是讲道理。如何讲深、讲透、讲话、讲好思政课，让学生“解惑”“尽兴”“管用”“获得”“满意”，必须善用“大思政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讲好“思政课”要做到“八个相统一”：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这是讲好思政课的遵循和基本原则，也是善用大思政课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善用“大思政课”，是全方位、全过程、全链条的系统工程，要全过程链接“师生家校社”、全局性优化“人财物时空”，把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线上与线下、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等有效融合起来，形成党委要领导好、政府要统筹好、社会要配合好、学校要建设好、教师要讲授好、学生要学习好的整体环境，推动形成“大思政课”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善用“大思政课”，不仅要与时俱进“常开”，而且要守正创新“善开”，以守正为根本，以创新为动力，善于进行课程创新、教材创新、教法创新、机制创新、实践创新；善于采用案例式教学、探究式教学、体验式教学、互动式教学、分众式教学等方式方法；善于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新媒体平台、全媒体资源，让思政课在与社会实践的关联和互动中活起来、实起来、强起来。（作者系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导，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坚持好运用好贯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

■ 陈朋

理，而且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人民立场必然要求以人民利益为重。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所奋斗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同志强调，我们党要“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在党的七大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进党章，正式成为党的宗旨。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党的历史实践时高屋建瓴地指出：“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思想主线，这就是：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这一理念不仅贯穿于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全部主题之中，而且升华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站稳人民立场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止于思想认识层面，而要体现在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实践上。人民是我们党各项工作的最高裁判者和最终评判者，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要由人民来评判，最终要看人民是否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得到了改善，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回应人民群众的诉求。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深化改革不断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物质精神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深刻领会基本观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观点，其中，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必须深刻领会的基本观点。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在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政治领导力

量。”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其内在要求。如果党中央没有权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不到有效执行，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自行其是，党的领导也就成为一句空话。坚持党的领导还要确立和维护党的领导核心。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进入新时代，确立和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保证，我们要自觉维护核心。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党在长期探索中坚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道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当代中国踏上新时代的康庄大道，使中国在诸多方面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让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这条道路是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适合时代发展要求并取得成功的唯一正确道路，它走得通、走得对、走得好，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大的梦想，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让中华民族的复兴有了“定盘星”。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推进了改革开放，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使中华民族焕发出蓬勃生机。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无比灿烂的光明前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根据时空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战略。步入新征程，我们党把实现民族复兴与现代化强国建设有机结合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把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与现代化的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既丰富了现代理论，又为新时代新征程如何推进现代化实践指明了方向，作出了新谋划。

准确把握重要方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着一系列重要方法，其中极为重要的是要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和问题导向。

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也是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来研究和解决问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来制定和形成指导实践发展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这意味着，要把实事求是牢记心头，搞清楚“实事”，了解实际、掌握实情，认真“求是”，深入探求事物发展规律。

深入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也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调查研究脚步遍布祖国大江南北：走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看真贫、扶真贫；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就“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问计于民。这说明，我们要继续重视深入调查研究，通过深入调研了解问题的真实情况，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推动事业发展。

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当前，我们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需要我们敢于正视问题、善于发现问题，不回避、不躲闪，瞄着问题去、迎着问题上、追着问题走，科学统筹解决事关战略全局、事关长远发展、事关人民福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作者系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共社科院基地特约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制度体系建设的百年演进及经验启示研究”（21&ZD043）的阶段性成果】

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无比灿烂的光明前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根据时空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战略。步入新征程，我们党把实现民族复兴与现代化强国建设有机结合在一起。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系统掌握这一思想的基本观点、科学体系，把握好这一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增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学到手，自觉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各项工作。”在开展主题教育过程中，必须深刻把握贯穿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并自觉运用这些立场观点方法改造主观世界，推动各项工作。

毫不动摇地站稳根本立场

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立场，不讳言自己的政治属性、政治理想、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把人民牢牢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依靠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秉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牢记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清晰地表明了立足于人民的根本立场。

站稳人民立场不仅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